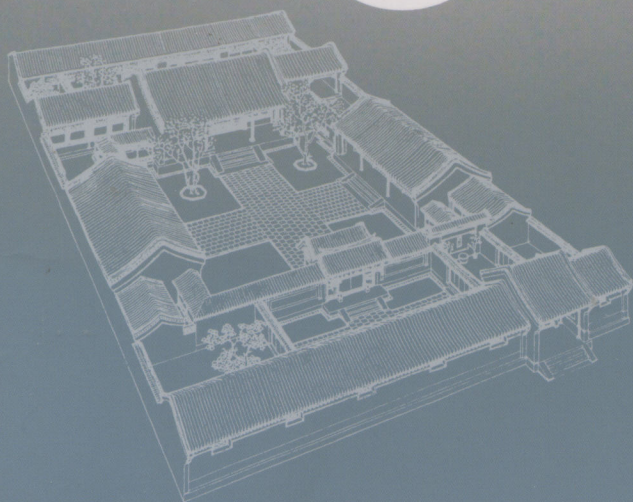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明〕计 成 著 赵 农 注释

园冶图说

修订版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〔明〕计成著 赵农注释

16

园冶图说

修订版



TU986

J150.02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园冶图说 (修订版) / (明) 计成著; 赵农注释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80713-874-7

I. 园… II. ①计… ②赵… III. ①造园林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②园冶—注释 IV. TU98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1148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王 芳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50×250毫米

16印张 2插页 443幅图 2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1月第2版

印 次 2010年1月第5次印刷

印 数 16000—24000

定 价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◆再版前言：乔木参天 虬枝拂地 /1

◆概说：境造桃源 巧夺天工 /9

◆冶叙 /21

◆题词 /27

◆自序 /35

◆卷一

◆兴造论 /43

◆园说 /48

◆一 相地 /56

(一) 山林地 /63

(二) 城市地 /67

(三) 村庄地 /71

(四) 郊野地 /74

(五) 傍宅地 /77

(六) 江湖地 /81

◆二 立基 /85

(一) 厅堂基 /88

(二) 楼阁基 /90

(三) 门楼基 /92

(四) 书房基 /94

(五) 亭榭基 /96

(六) 廊房基 /99

(七) 假山基 /101

◆三 屋宇 /103

(一) 门楼 /108

(二) 堂 /112

(三) 斋 /114

(四) 室 /115

(五) 房 /117

(六) 馆 /119

(七) 楼 /121

(八) 台 /125

(九) 阁 /127

(十) 亭 /128

(十一) 榭 /132

(十二) 轩 /134

(十三) 卷 /135

(十四) 广 /136

(十五) 廊 /137

(十六) 五架梁 /138

(十七) 七架梁 /138

(十八) 九架梁 /139

(十九) 草架 /139

(二十) 重椽 /139

(二十一) 磨角 /140

(二十二) 地图 /140

屋宇图式 /142

◆四 装折 /147

(一) 屏门 /150

(二) 仰尘 /152

(三) 户榻 /153

(四) 风窗 /156

山装折图式 /160

桶棂式 /161

◆卷二

◆栏杆 /173

栏杆图式 /175

◆卷三

◆五 门窗 /201

窗门图式 /206

◆六 墙垣 /213

(一) 白粉墙 /220

(二) 磨砖墙 /220

(三) 漏砖墙 /220

漏砖墙图式 /221

(四) 乱石墙 /227

◆七 铺地 /228

(一) 乱石路 /228

(二) 鹅子地 /229

(三) 冰裂地 /229

(四) 诸砖地 /229

砖铺地图式 /233

◆八 掇山 /239

(一) 园山 /243

(二) 厅山 /245

(三) 楼山 /247

(四) 阁山 /248

◆(五) 书房山 /249

(六) 池山 /250

(七) 内室山 /251

(八) 峭壁山 /252

(九) 山石池 /254

(十) 金鱼缸 /255

(十一) 峰 /256

(十二) 峦 /259

(十三) 岩 /260

(十四) 洞 /261

(十五) 涧 /262

(十六) 曲水 /263

(十七) 瀑布 /266

◆九 选石 /268

(一) 太湖石 /272

(二) 昆山石 /276

(三) 宜兴石 /277

(四) 龙潭石 /278

(五) 青龙山石 /279

(六) 灵璧石 /281

(七) 岷山石 /283

(八) 宣石 /284

(九) 湖口石 /285

(十) 英石 /286

(十一) 散兵石 /288

(十二) 黄石 /289

(十三) 旧石 /291

(十四) 锦川石 /293

(十五) 花石纲 /295

(十六) 六合石子 /297

◆十 借景 /300

◆自识 /309

◆跋语 /310

◆再版后记 /312

◆目

录



再版前言：乔木参天 虬枝拂地

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。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”（宋·范仲淹）少年时读此诗时，只是一片水光山色的向往。等待人事繁复、行色苍茫之时，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数年前，我撰写《园冶图说》时，对《园冶》作者计成心中多存疑虑，生平事迹不详，原因是记载太少。计成的《园冶·冶叙》中有“松陵计无否”的说法，而吴江市府正置在松陵镇。

甲申（2004）初夏，我访江南，顺道赴吴江松陵一游。是日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道路整洁，草木葱郁。此回来吴江，除了会友问胜，也有进一步了解计成故事的心愿。

吴江的同里退思园，为清代晚期的雅园巧构，现已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”，亦成为江南园林的典范。吴江政协的薛群峰、沈昌华先生忙中抽身，陪同游园，绿荫伞伞，秀石婷婷，“进则尽忠，退则思过”的退思园倒引发了许多人事的感想。“望云惭高鸟，临水愧游鱼。”（晋·陶渊明）边走边谈，沈先生对计成的身世探讨和研究，颇有新意，使我很受启发。这些计成故里松陵的热心人士，出于对《园冶》与计成的景仰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。

计成是明末清初的中国园林大师。但是三百年来，《园冶》被淹没在浩瀚如烟的史料之中，几乎默默无闻。

吴江在苏州的南面。吴江旧称松陵，境内有吴淞江，吴淞江也称松江，为太湖入海的通道，因江阳有高地如丘陵，地名沿为“松陵”。

《吴越春秋·勾践伐吴外传》中有“越王追奔，攻吴兵，入于江阳松陵”的说法，由此得知松陵当在吴越时就已经得名。唐代置松陵镇，后梁开平三年（909），吴越王钱镠设置吴江县于松陵镇，由此后来多称吴江。

松陵是江南名城，地处苏杭之间，其地还有一名胜“垂虹桥”，原为木结构，始建于宋代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元代翻建为石桥，有“环如半月，长如垂虹”的赞誉。因水道幽曲，古桥盘桓，人物鼎盛，吴江盛物历来多为人们吟咏。如“秋风起兮佳景时，吴江水兮鲈正肥”（晋·张翰）、“吴

江田有粳，粳香春作雪；吴江下有鱼，鲈肥脍堪切”（宋·梅尧臣）、“扁舟系岸不忍去，秋风斜日鲈鱼乡”（宋·陈尧佐）、“请君听说吴江鲈，除却吴江天下无”（元·郭梅西），所以，吴江人也可自豪地说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中间有吴江”。吴江历史悠久，临近太湖，经济繁盛，自古为江南丝绸之地、鱼米之乡。

物宝天华、地灵人杰的吴江，除去政治、军事、文学等方面的优秀人物之外，还有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，尤其是“实学”方面的人物非常引人注目，古有陆龟蒙（？—约881）的《耒耜经》，为中国最早记载和研究农具的著作；沈子由（1490—1563）的《吴江水考》，是利国益民的地方水利书籍；袁黄（生卒年不详），万历年间进士，对历法、水利、河渠等问题，有深入的研究；王锡阐（1628—1682）的《晓庵新法》，精研天文学，以集中西历法之优点，多有创见；孙云球（1630—1662）的《镜史》，开中国眼镜及各种光学仪器之先河。计成（1582—？）的《园冶》，为中国古代造园宝典，而今有费孝通（1912—2005年）的《江村经济》，影响广泛，实为“乡土中国”的缩影。

这种奇特的人文景象，对于研究吴江文化以及计成的《园冶》，都有着重要的启示。

计成，字无否，号否道人，出生于明代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《园冶·冶叙》中提及计成是松陵人，其青少年时代应该在吴江度过。

计成一生精通绘画，擅长诗文，并对造园独有所心得。《园冶》一书中作者娴熟地引用大量的典故或作品，一方面展示了自身的知识才华，另一方面也提示了计成青少年时期饱读诗书、心志高迈的精神生活。

在《吴江县志》中记载：吴江“佛事兴盛，寺庙林立”、“佛教在明代最盛”，嘉靖时境内曾有284处寺庙庵堂，同时也有众多的道观。作为少年儒生的计成一定会在内心保留许多佛释的知识，最后融进了《园冶》的知识论述中。

明代吴江隶属苏州。吴江的风俗在“清代以前，男子十二岁左右开始蓄发，梳成总角，十六岁始冠，二十岁行冠礼”（《吴江县志》），是为社会文化风俗的倡导，推想计成也应该是如此的青少年生活方式。

明代吴江戏曲文化繁盛，在中国戏曲史上，万历年间以沈璟（1553—1610年）为代表的“吴江派”，产生了极大影响。沈璟即为松陵镇人，万历二年进士，曾任光禄寺丞，后退归隐。其昆曲声律的研究成就卓越，著有《属玉堂传奇》等，沈璟精于音律，博得了众多人的追捧，世有“吴江派”的称誉，可与汤显祖的“临川派”云峰并立，遥相辉映。沈氏家族从事戏曲乐律代为相传，也使吴江一地在江南戏曲文化中占一席之地。

沈璟长计成29岁，应该是前辈文人，是对计成有所影响的文化人物。此外，明代松陵文人顾大典也创作戏曲作品，培养乐伎，并有《清音阁四种》传世。顾大典这些昆曲流风，是吴江家乐繁盛、艺事竞传的时尚，使计成

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充满了新鲜好奇。

《园冶》有着独特的文学语言的价值。晚明江南文人的许多笔记中，多以骈文对偶的文体方式，一咏三叹，感怀物事。因此《园冶》书中也多采取骈文的形式，深得中国古典文学语言雅致精炼的精髓，韵味无穷，使人阅读《园冶》之后，获得一种精神超越的美感所在。这其中戏曲文学的影响也随处可见。

吴江古风荡漾，民艺浓郁，民间的山歌、舞蹈、曲艺，每逢节日，热闹非凡，生长于此的计成，耳闻目染，身心俱浸。后来所著《园冶》，亦不仅仅是造园的技术，而且有着人文知识的感召。

计成于崇祯辛未年（1631）49岁时在“扈冶堂”写的《园冶·自序》回顾自己的少年生活：“不佞少以绘名，性好搜奇，最喜关全、荆浩笔意，每宗之。”

一个人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生活，必须有着良好的富裕的家庭生活背景。研究《园冶》和计成，需要重视万历年间的社会以及松陵地区的文化环境。

计成出生时的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正是大明帝国的首辅张居正病逝的那年，也是大明帝国进入政治晚期阶段。

计成21岁时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的“妖书案”，是社会对神宗的郑贵妃欲立自己儿子为太子的敏感话题的揭示，引起轩然大波。

计成33岁时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的“闯官挺击案”，再次引发了朝廷的混乱。万历皇帝立朝48年，为了追求荒淫无耻、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，派出太监开矿征税，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，最终却陷入经济衰败危机。

计成38岁时，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神宗皇帝逝世，泰昌皇帝即位，然而一个月后，泰昌皇帝服用了红药丸后突然死去，导致了“红丸案”的荒诞离奇。

表面上看来，朝廷的大事还没有影响到江南的民间社会生活，江南经济生活在不断地发展。尤其是吴江的蚕桑纺织业，逐渐代替种植耕作的农业生产，“蚕桑压倒稻作”。吴江的发展规模也进一步提升，从弘治年间的二市四镇到明末已增为十市七镇。

但是，作为文化思想形态的社会情形却不容乐观。

计成22岁时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以顾宪成、高攀龙为首的东林书院在无锡县城创建；到了计成43岁的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东林书院却被禁毁。由学术争鸣到政治意气相争，再以“朋党”论及，最终以政权力量解散东林书院。这个事件波及到江南地区众多的思想文化人士，一些朝野人士借风使船，掺杂着个人的恩怨，以至卷入了许多君子和小人，鱼龙混杂、真伪相冒的结局，长期使文坛浊流风行。

这段时间正是计成精神生活的关键时期。

崇祯辛未年（1631）计成49岁，回忆当时是“游燕及楚，中岁归吴，择居润州”。为什么要“择居润州”，而非“松陵”？

这其中有一句话：“中岁归吴”，这个“吴”过去多认为泛指江苏，但是这里应是指苏州或者松陵，然后再“择居润州”。计成居润州不久，若“适晋陵方伯吴又于公闻而招之”当在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计成41岁。此时开始从事造园活动。

“润州”为江苏镇江的旧称。隋唐时期均在镇江设置润州，北宋徽宗时改为镇江府，因而明人也多以镇江称润州。镇江地处长江之滨，水色山光融为一体，又是江南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，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，交通经济非常发达。

可以假设，“择居润州”恐怕还有躲隐的原因。躲隐于市，一为逃亡，这个“择”字就非常重要；二为谋生，“择居润州”也很重要。

计成此时开始以“计成，字无否”行世。有其逃离家园、埋名隐姓的现实需要，也有励惕困守、甘苦自知的含义。来往的人物中有阮大铖、钱谦益等人。

钱谦益（1582—1664年），字受之，号牧斋，常熟人，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进士，天启五年（1625）因东林党案削职，崇祯元年（1628）46岁复职任礼部右侍郎，后因与礼部尚书温体仁争权失败，48岁被革职归隐。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）任礼部尚书，不久降清。

钱谦益与计成同岁，降清前的作为及文章在士林有广泛影响。若与计成深交，亦有可能，后来阮大铖给《园冶》写《冶叙》，是不是也有顺藤摸瓜，攀交钱氏，以求东山再起的意思呢？而《镇江市志》中也有计成“以代豪门巨族建造园林为生，并结识了常熟钱谦益”的说法。

而不甚知底细的人，如阮大铖在《园冶·冶叙》中说“‘冶’之者松陵计无否，而题之冶者，吾友姑孰曹元甫也。无否人最质直，臆绝灵奇，依气客习，对之而尽。所为诗画，甚如其人，宜乎元甫深嗜之”、“计子之能乐吾志也，亦引满以酌计子，于歌余月出，庭峰悄然时，以质元甫，元甫岂能已于言？”从语气上看，大约阮大铖对计成评价颇高，并略有求乞计成造园之意，亦见计成造园的名气在江南影响广泛，“并骋南北江焉”。

阮大铖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《明史·列传一九六》：“马士英，贵州人。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。”同时的还有曹元甫，亦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曹氏名履吉，字元甫，号根遂，有诗文集多卷传世。

阮大铖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，如果不是在南明政权弄权以及城破前逃跑，漂流浙闽一带，随后又降清等后半生的一系列恶劣行径，也许仅仅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人物。但是，从隐居南京始，不甘寂寞，引起东林及

复社人士的攻击，而阮大铖也极力攀交马士英等权贵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因此，从根本上说，阮大铖自己走了一条从私欲到邪恶的不归之路。

由于计成已经成功地构筑了武进吴又于的“东第园”（天启三年）、仪征汪士衡“寤园”（崇祯四年）、扬州郑超宗“影园”（崇祯七年）等私家园林，与许多文人雅士相互交往，奔走于朱门之间，不是“鸠匠”，已是“能主”。

阮文中“松陵计无否”是《园冶》中唯一提及计成籍贯之处。

阮大铖这段话写于崇祯甲戌年，即崇祯七年（1634）。当时计成52岁，而阮大铖约47岁，正在因崇祯二年（1629）“定逆案，论赎徒为民，终庄烈帝世，废斥十七年，郁郁不得志”，阮大铖刚刚过了5年的庶民生活。

阮文还有“銓江地近，偶问一艇于寤园柳淀间，寓信宿，夷然乐之”，得知仪征境内銓江附近，有计成规划构筑的汪士衡寤园，阮大铖常常访问并留宿其间。

阮大铖诗：“无否东南秀，其人即幽石。一起江山寤，独徇烟霞格。缩地自瀛壶，移情就寒碧。精卫复摩呼，祖龙逊鞭策。有时理清咏，秋兰吐芳泽。静意莹心神，逸响越畴昔。露坐虫声间，与君共闲夕。弄琴复衔觞，悠然林月白。”（《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》），从中可以看到计成有诗作与其交流，获得阮大铖的好评。另有相关的诗：“大隐辞金马，多君撰薜萝。圣游宾漠野，倒景烛沧波。虑澹烟云静，居闲涕笑和。鸾情复何极，高咏出层阿。”“桃源竟何处，将以入青云。众雨传花气，轻霞射水文。岩深虹彩驻，淀静芷香纷。诂遣渔舸至，灵奇使世闻。”“神工开绝岛，哲匠理清音。一起青山寤，弥生隐者心。墨池延鹄浴，风篠洩猿吟。幽意凭谁取，看余鸣素琴。”“缩地美东南，壶天事盍簪。水灯行窃月，鱼沫或蒸风。自冠通入旨，慵教俗子谄。祇应佩芳草，容与尚江潭。”（《宴汪中翰士衡园序》），似乎应该写在崇祯四年（1631）汪士衡的“寤园”构筑完毕，阮诗华丽而浮躁，应与汪士衡非常熟悉。

阮大铖热衷于戏曲写作，有《燕子笺》《春灯谜》等传世，辞藻华艳，离奇古怪。阮说：“其事臆，无取于稗官野说，盖稗野亦臆也，则吾宁以吾臆为愈。”如此自负，也如此专横，堆砌与编造，也就无什么艺术上的意义。

但是，后人对阮大铖的认识，多是从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开始的。孔尚任借戏曲人物之口，传达出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”（《桃花扇·先声》）的思想。其中，阮大铖自言道：“倘遇正人君子，怜而收之，也不失为改过之鬼，若是天道还好，死灰有复燃之日。我阮胡子呵！也顾不得名节，索性要倒行逆施了。”（《桃花扇·侦戏》）

更绝妙的是烈女李香君大骂：“阮大铖趋附权奸，廉耻丧尽；妇人女子，无不唾骂”、“东林伯仲，俺青楼皆知敬重。干儿义子从新用，绝不了魏家种。”

此刚烈女子的铿锵之音，岂不是将阮氏辈骂得原形毕露、遗臭万年。

1634年的钱谦益还归隐在家，在社会上声誉日隆，正“等”着六年以后（1640年）的柳如是到来。在柳如是来嫁之前，钱谦益有的是时间，与士林友人消磨，其中就有计成，甚至阮大铖。

回过头看，与钱谦益相比，阮大铖却声名狼藉，虽然同是归隐，最初迫害东林党人时，阮大铖正是阉党积极分子，相传炮制东林党点将录，曾将钱谦益圈入。如今，两人的境遇不同，心境也不同。阮大铖在南京臭名昭著，被复社人士抨击。等待时机，投靠马士英，两人狼狈为奸。而钱谦益长期闲居，声誉虽佳，但是经济窘迫，加之也有政治野心，投靠了马士英，而成为了南明小王朝的礼部尚书。

阮大铖借钱谦益的清誉洗刷自己，钱谦益是借阮大铖与马士英的势力，钱谦益是私心太重，阮大铖是诡计无穷。

钱谦益是“红粉情多青史轻”（清·袁枚），1645年的5月，钱谦益为首开城门，迎降清豫亲王多铎。随后钱谦益卖命地为清招抚江南士人，以至北上再过清政府的官瘾。后来的钱谦益虽然也做了一些反清复明的事情，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，多是因为私心慰藉的需要。

阮大铖在南京沦陷前逃跑了，第二年降清，并带着清军搜捕抗清的义军，最终暴死于福建仙霞岭。

这一系列巨变中，至少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。不管这个人是在苏州，还是润州，还是扬州，或者常州。

如果是计成，也是63岁。一帮高谈阔论的故人，降的降，逃的逃，乱世之中，痛恨与无奈，手中还拿着一卷有阮大铖题《冶叙》的《园冶》，也是感慨万千！苟全性命于乱世，还修什么园林？真可谓：看破世事惊破胆，识透人情冷透心！

南京沦陷前十年时，计成已在《园冶·自识》中说：“崇祯甲戌岁（1634），予年五十有三，历尽风尘业游已倦，少有林下风趣，逃名丘壑中，久资林园，似与世故觉远，惟闻时事纷纷，隐心皆然，愧无买山力，甘为桃源溪口人也。自叹生人之时也，不遇时也，武侯三国之师，梁公女王之相，古之贤豪之时也，大不遇时也！何况草野疏遇，涉身丘壑，暇著斯‘冶’，欲示二儿长生、长吉，但觅梨栗而已。故梓行，合为世便。”此“予年五十有三”当为虚岁，与前后文实指年龄不矛盾。

文中有“予年五十有三，历尽风尘业游已倦”的感慨，又有“似与世故觉远，惟闻时事纷纷，隐心皆然，愧无买山力，甘为桃源溪口人也。自叹生人之时也，不遇时也”的悲歌。但是，“暇著斯‘冶’”一是为了“欲示二儿长生、长吉，但觅梨栗而已”；二是“故梓行，合为世便”。

同时也应和了郑元勋提出“字内不少名流韵士，小筑卧游，何可不问途无否？但恐未能分身四应，庶几以《园冶》一编代之。然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，而所传者只其成法，犹之乎未传也。但变而通，通已有其本，则无传，终不如有所传之足述，今日之‘国能’即他日之‘规矩’，安知不与《考

工记》并为脍炙乎？”（《园冶·题词》）

第二年，郑元勋在崇祯乙亥年（1635年）时，于自家的扬州影园《园冶·题词》写道“予与无否交最久，常以剩山残水，不足穷其底蕴”，可知1635年，当时计成53岁，计成帮助其完成构筑了扬州“影园”。

1643年，郑元勋40岁中进士，却在次年被人误杀。南明政权初立，养虎为患，军阀拥兵自重，江北四镇的军阀高杰，企图据兵扬州，遭到民众的抵抗，郑元勋好事多义，出面调停，与高杰协议安置官兵亲眷。扬州民众却于愤懑之中，群起而攻击郑元勋，泄其怨恨，当场将其击毙，以至郑元勋白白地丧失其性命。

三

浮萍身世，秋水文章。计成的时代是天崩地裂的时代。计成交游的友人或隐或显，多为时局中人，而郑元勋、阮大铖、曹元甫、钱谦益等人结局虽然不同，但是多与计成相友善，亦知计成非仅仅营造园林的“鸠匠”，与一般造园家还是不同，而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雅士。究其与计成往来人物，也许隐隐约约地察觉生存其间“自叹生人之时也，不遇时也”的计无否。

明清之际的裂变中，一时群雄并起，鱼龙混杂，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，人事纷纭，跌荡起伏。但是晚明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就是涌现出一大批“能工巧匠”式的学者和图书。如徐光启（1562—1633年）《农政全书》，宋应星（1587—？）《天工开物》，天启七年刻印的王徵（1571—1644）笔译《远西奇器图说》、文震亨（？—1644）《长物志》，以及万历年间刻印的《鲁班经匠家镜》，万历年间的周履清《群物奇制》，甚至徐霞客（1586—1641年）《徐霞客游记》等。还有前文提及的吴江地区的“实学”代表人物。

这些著述既不同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章，也不是空谈“性命”的学理大义，而是以“经世致用”为目标，关心社会生存的“实学”。宋应星说：“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！”（《天工开物·自序》）

在这些社会背景中，计成《园冶》的出现也就不是偶然的现象。

江南私人园林艺术在明代中晚期的开始兴盛，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个人生存与专制社会的矛盾，因而出现了大量息政退思，独善其身的兴造园林的风气。汇江河山川，聚古木奇石，演化出人间仙境，终于一园，的确是一种园林文化极致的所在。园林也就成为了人生最后的退养之地。

计成生活的江南，无论是“松陵”，还是“润州”、“銓江”，社会需求对于文化发展的推动，也导致作为造园思想和技术水准的最高经典《园冶》的必然出现。

这种学风标志着当时社会文化风气的进步，也是数百年后，《园冶》

依然光彩夺目的根本原因。

中国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自然人文的向往，园林生活的方式，又一次呈现在人们目前。《园冶》中完整深刻的造园理论，正成为一种追古知今的思想文化资源。

吴江市为了纪念计成，弘扬园艺事业，近年在松陵镇特地修建了一座“计成纪念馆”，展陈了有关计成的资料与事迹，对于《园冶》的研究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随着当代园林事业的兴盛，造园事业重新被认识，计成研究也出现了许多热点，并针对性地引起了商榷与讨论，奇文共赏，辨析识疑，使研究不断深入。这是好事，一种事业关注的人越多，才越有兴旺发达的可能，引起兴趣的话题越热烈，也才有存在的必要。

近年日本造园学著作《作庭记》被翻译引进，引起学术界和建筑界的广泛注意，《作庭记》成书于12世纪左右，最初的作者为橘俊纲（1028—1094），是日本藤原时代（894—1185）的贵族后裔，曾以园事日记记载造园事务，被后人编辑为《山水抄》的版本流传，其中对“立石”、“汀形”、“岛姿”、“立流”、“落流”、“澮水”等问题，进行了细致地论述，具有日式造园技术的经典意义。虽说日式园林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盛唐文明，但是因地制宜的变化利用，对于园林文化的发展，也形成了日式自身的特色。因此，后来日本学者对《园冶》的重视与保存，也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和经验。国宝的损坏与流失又岂只是《园冶》哉？

《园冶》数百年来被湮没，流失国外；数十年来的研读，多在建筑界的范围内，只是近年刚刚走进社会生活中。因此，还需要更多的人解读、体味其中的涵义。计成是松陵的计成，也是中国的计成；是明代的计成，也是现代的计成。

长安夜晚，月光泻地。我翻阅着《园冶》，脑海中不断闪现着绿色暖意的江南水乡。由此想起汉唐时的丝绸，也多是从江南运往长安，再由长安运往西域。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因为有一条条从江南牵引过来的丝线。

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！”（《牡丹亭·惊梦》）

2008年9月抄改于西安



概说：境造桃源 巧夺天工

一、计成和《园冶》

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

一部《园冶》被誉为中国最早关于造园艺术的专门著作，但是从《园冶》出现以来，却由于种种原因，在国内几乎销声匿迹了近三百年，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中国，国内学术界、建筑界等人士不断地研读，才逐渐认识了《园冶》的价值和其作者计成。

计成，苏州吴江人，字无否，号否道人，出生于明代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卒年不详，推测应活了60岁左右，即老年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。

计成在《园冶》中自署松陵人，松陵即吴江，吴江在苏州南面，而“否”意应为《易经》卦象中的“否”。细读之下，发现“否”与计成的一生经历真有暗合神似的地方。《易经》上说否卦，是象征着由泰变否的过程，并非是人为的原因，也有天时的变化，要贞正自守。君子要以德行约守自己以避免灾难，不可以妄求荣耀与财富。这里既包含了明清之际的裂变，也有计成与阮大铖的交往，导致《园冶》的近于湮没。

尤其是“初六：拔茅茹以其汇”，讲否卦的第一爻，就是拔起茅草，贯通汇集。这正应计成的造园活动。当然，计成最初的命名意义，还是“象曰，天地不交，否”，“无否”即“成”。但是，这个“无”，是计成与时代和命运抗争的过程，最终还是“自叹生人之时也，不遇时也”（《园冶·自识》）。

计成所生活的社会时期，正是大明帝国处于斜阳西下、暮气沉沉之时，从万历皇帝到泰昌、天启，再到崇祯皇帝，明代的政权制度正一天天向下滑行，而封建统治弊端之一的党争，也随着人事的变化而出现了激烈的格局。如天启年

